

中国哲学史

上册

(讨论稿)

北京大学哲学系
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

1977年6月修订

目 录

第一编 奴隶制时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商周——春秋）

第一章 古代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产生及其反对有神论的斗争.....	7
第一节 殷周时代的宗教迷信.....	7
第二节 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萌芽.....	10
第三节 无神论观念的兴起.....	14
第二章 孔丘的唯心主义和墨翟反对孔丘学说的斗争.....	17
第一节 孔丘的仁和唯心主义先验论.....	17
第二节 墨翟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他对孔丘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批判.....	36
第三章 孙武“奇正相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55

第二编 封建制形成时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战国）

第一章 战国前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孟轲唯心主义的斗争.....	70
第一节 前期法家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告子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	70
第二节 孟轲的“入性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	76

第二章 《管子》书中《心术》等四篇的唯物主义	
和老、庄的唯心主义的斗争	90
第一节 老子的唯心主义和辩证法因素	90
第二节 《管子》书中《心术》等四篇的唯物	
主义	100
第三节 庄周的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	110
第三章 后期墨家的唯物主义和名家的斗争	121
第一节 惠施、公孙龙的名辨思想	121
第二节 后期墨家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130
第四章 战国末期唯物主义的发展和《易传》中的	
辩证法思想	142
第一节 《易传》中的辩证法思想	142
第二节 荀况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151
第三节 韩非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唯物主义无	
神论思想	169

第三编 封建制前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汉——唐）

第一章 汉代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反对宗教唯心主义的斗争	193
第一节 董仲舒的神学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	
体系	193
第二节 王充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	209
第二章 魏晋时期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	227
第一节 王弼的唯心主义玄学体系	229
第二节 魏晋时期唯物主义者对唯心主义玄学	
的批判	246

第三节	郭象的主观唯心主义和诡辩论	262
第三章	南北朝时期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反对佛教唯 心主义的斗争	277
第一节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唯心主义和形而上 学	277
第二节	范缜的战斗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	301
第四章	隋唐时期佛教唯心主义的发展	320
第一节	玄奘与唯识宗	324
第二节	法藏与华严宗	332
第三节	惠能与禅宗	340
第五章	韩愈的唯心主义及其反对佛教的斗争和柳 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	350
第一节	韩愈和李翱的唯心主义及其反对佛教 的斗争	354
第二节	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	369

第一编 奴隶制时期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的斗争(商周一春秋)

我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将近四千年文字可考的历史记载。据考古发掘，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是生活在距今约五十余万年前蒙昧时代初期的人类。中华民族经过了长期的原始社会生活，约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同时推动了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原始社会的人们在劳动生产中，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发展了他们的思维认识能力。我国古代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例如，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神农尝百草等等，反映了我国古代人类思维发展的原始状况。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我国古代流传的这些神话和传说，反映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积极意义，但它是在想像中并通过想像来表达的，终究是不切实际的。

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认识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5页）。据我国考古发掘发现原始社会的墓葬中已有随葬物品，这说明原始社

会人们相信人死后还继续其生前的生活，所以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随葬。同时由于当时人们对梦境也不能正确理解，所以认为有离开肉体而存在的灵魂。这些都是宗教迷信、唯心主义原始的认识论上的根源。

另一方面，原始社会的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和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也逐渐地积累了一些实际经验，对自然界的一些简单规律、物质现象也有一些朴素的了解，对客观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现实的态度。这可以说是无神论、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萌芽。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开始出现分化。据考古工作者在山东发掘的这一时期墓葬中，发现随葬品悬殊很大，最多的随葬品达 160 件，其中包括贵重的消费品，如玉环等。这说明当时已有了贫富分化。氏族首领利用权力对氏族成员进行剥削才可能获得这些奢侈品。原始社会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则遭到破坏，出现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形成了阶级的对立。公元前两千多年，我国建立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王朝，从此我国进入了阶级社会。我国奴隶制经过夏、商，到西周时期（约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770 年）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我国奴隶制的经济特点是奴隶主贵族占有土地和奴隶，通过井田制和分封制分给各亲族和同盟的民族或部落，建立许多大小不等的诸侯国，以保卫整个奴隶制的经济制度。到了周代，在政治上则是采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世袭制度，实行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的等级制，维持和巩固加强奴隶主贵族的专政。各级奴隶主享有种种经济、政治、法律上的特权，而奴隶们则被剥夺了一切权力，甚至被看作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奴隶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就是奴隶与

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斗争。夏王朝最后一个国王桀被受压迫的奴隶们咒骂说：“时日害(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汤誓》）。意思是日头那一天毁灭，我们情愿和你一同毁灭！这里可以看到被压迫的奴隶们对反抗奴隶主统治的坚强决心。又如周王朝起兵打商王朝时，被商王朝驱使到前线作战的上万名奴隶举行起义，从而摧毁了商王朝的政权，这也说明了奴隶们反抗斗争的激烈和他们在推动社会历史前进中的决定作用。

哲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直接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服务的。夏代的奴隶主，已开始用宗教迷信来为其统治的合理性论证，作为欺骗、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史书上传说他们声称自己的政权是得之于“天命”的。到商代更抬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叫做“帝”或“上帝”，形成一种与巫术密切结合的宗教迷信。这种宗教认为“上帝”是整个自然、社会的主宰。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经常利用“天罚”来威吓人民，假托神意来迫使奴隶等去从事战争、耕作和贡纳财物。西周统治者对这些传统的宗教迷信又有所发展和补充，他们用统治者的道德行为作为补充，以说明“上帝”不断更换统治者的理由，这样也就使它的欺骗性更大。总之，这时的宗教已不同于原始社会的迷信了，它已经完全成为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充满了阶级压迫的内容。

在奴隶制社会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现象和规律也有进一步的认识，发展起了初步的自然科学知识。夏代已有了纪年的历法，商代在夏代历法的基础上，已有了隔若干年置闰月来调整季节的办法，而且采用干支纪日法。在数学上商代已采用了十进位，并且有了“规”、“矩”等字，说明当时数学的发展情况。在农业上商代人已

懂得培土壅苗，流水灌溉等，还有了酿酒、缫丝、绩麻等生产技术。到西周时期，在农业生产上发明了轮流休耕，保护土地肥力的“三圃法”，初步懂得了施肥、中耕、治虫、选种等。在天文方面建立了专职人员，《诗·小雅·十月之交》中记载的一次日食，是世界公认的最早的日蚀记录。生产发展促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丰富，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资料。因此，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在反对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古代朴素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起来。思想战线上形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

西周末年，奴隶制开始崩溃。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03年，史称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改革，特别是铁器农具的使用和用牛耕田，生产力进一步得到发展，同时由于奴隶们的不断起义反抗和大量逃亡，旧奴隶制生产关系已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在一些诸侯国中奴隶主为了招徕奴隶劳动力，获得更多的财富，在原有的分封地之外，又强迫奴隶开荒扩大耕地面积，这样私田大量出现，封建依附关系也开始出现和发展起来。新的封建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公元前594年，鲁国的“初税亩”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承认实行按亩收税的制度，承认分封地之外的私田的合法性。也可以说是新的地主阶级第一次得到合法承认，并登上历史舞台。随后，齐、晋、郑等几个大诸侯国都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封建地主阶级逐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了优势，经过长期的反复斗争，我国封建制的正式确立是在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斗争十分尖锐。这时奴隶主贵族已经没落，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对奴隶和平

民实行了更加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例如，当时在齐国“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左传》昭公三年）。奴隶们辛辛苦苦劳动所得的东西，三分之二被奴隶主贵族剥夺了去。在晋国“民间公命，如逃仇寇”（同上）。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使当时的人民如逃避仇人强盗一样，逃避奴隶主贵族的政令。剥削、压迫得越利害，反抗也必然愈烈。春秋时期奴隶和其它劳动人民反抗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暴动和起义史不绝书。

公元前656年、641年和624年，蔡、梁、沈三国先后发生“民溃”（起义），结果使梁、沈两国都亡国了。公元前550年，陈国贵族庆氏，逼迫人们修城，并杀人示罚，役人就秘密联络起来，杀死了大小监工和庆氏兄弟。公元前478年和470年卫国两次发生手工业奴隶的起义，先后赶跑了卫庄公和卫侯辄。相传当时有一个奴隶起义军的领袖“跖”，奴隶主贵族诬蔑他为“盗跖”。他所领导的起义军队伍规模和声势极大，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庄子·盗跖》）。他的影响是：“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荀子·不苟》）。又据《吕氏春秋·当务》篇记载，盗跖临死时，让人在他手里放一个金椎。他说，在地下遇见“六王五伯”时，好用金椎敲他们的脑袋，表现了跖的彻底造反精神。春秋时期的这种奴隶和劳动人民的起义、暴动，是摧毁奴隶制经济和政治统治，使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根本动力。

春秋时期，新兴封建地主势力和没落奴隶主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在这个社会大转变的斗争中，新兴地主阶级主要是依靠和利用了奴隶和平民的力量才战胜奴隶主贵

族的。他们采用各种方法，如减轻赋税，灾年贷粮，论功行赏等以争取逃亡的奴隶，笼络人心，扩大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新兴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也不是和平的，而是经过暴力的流血斗争的。如齐国的田氏，从公元前532年至公元前475年的近60年中，依靠劳动人民的力量，经过三次武装搏斗，才最后灭掉高、栾、鲍、崔、庆等十余家旧奴隶主贵族的势力，在齐国掌握了政权。在晋国，新兴地主阶级也经过两次大血战，才形成韩、赵、魏三个封建国家。在阶级社会中，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一个阶级替代另一个阶级，离开了暴力革命是根本不可能的。

春秋时期复杂而尖锐的阶级斗争，推动了哲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没落奴隶主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竭力鼓吹有意志的天，要人们听从于“天命”的安排。新兴地主阶级及其同盟者小生产者则运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结合本阶级的利益，用无神论、唯物主义反对“天命”论的宗教有神论和唯心主义。这时哲学上的主要代表有：以墨子为代表的，反映新兴地主和小生产者利益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反对奴隶制礼乐制度的思想，以孔丘为代表，反映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维护奴隶制礼乐制度的思想，两者之间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这一时期除了思想战线上有孔墨两家斗争之外，春秋末年还出现了我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在他所著的《孙子兵法》一书中，总结了我国古代的作战经验，书中包含有古代的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第一章 古代无神论和唯物主义

自然观的产生及其反对有神论的斗争

第一节 殷周时代的宗教迷信

夏王朝的建立是我国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开端。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便产生了阶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奴隶主贵族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便把原始的宗教迷信加以提高和改造。这时的宗教已经不再是自然宗教，而成为反映社会阶级压迫的宗教。从此以后，宗教迷信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得力工具。

公元前十七世纪末，商汤灭夏，建立了奴隶制的商王朝。统一君主的出现，因而宗教也就必然要出现一个具有新特点的至上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地上没有一个统一的君，永远不会有统一神。统一神是统一东方暴君的副本。商奴隶主贵族，为了加强其统治，泡制了一个天上和人间、社会和自然的最高主宰“帝”或“上帝”，制造了政权神授的谎言。借助这至上神对各种族的奴隶实行血腥的统治。商的奴隶主贵族说：“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这就是说其祖先是“帝”或“上帝”的儿子。实际上就是宣称他们自己是“帝”或“上帝”的子孙，商最大的奴隶主

——王，就是这至上神“帝”或“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他们的政权则宣称是“上帝”赐给的，因而也是永恒的；他们的一切言行都宣布是“上帝”祖先指命的，鬼神庇祐的，谁违背了他们的意志，就是违背了上帝和祖先的指命，那就要大难临头。据说，上古时代的“皇帝”，“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将沟通“上帝”和人间的关系限制在巫、祝、史的手中，而国王就是这些巫、史、祝的首领。商代人不仅经常祭天祭祖，乞求降福禳灾，而且在事事之前都必须进行占卜，如作战，筑城，开河，种获等，都要烧灼龟壳和兽骨，观其裂纹（兆），来预定凶吉，决定行动。

商奴隶主贵族不仅泡制这个最高主宰“帝”或“上帝”，而且还垄断了上帝和下帝及人间的联络。这样，商奴隶主贵族就可以为所欲为。为了自己的享受，商的奴隶主贵族不仅在活着的时候要敲榨奴役大批的奴隶，而且在死后，还要用几拾几百甚至上千的奴隶进行殉葬和祭牲。他们把这一切都看作是授命于“帝”或“上帝”的。在他们看来，奴隶的生存就是为着让奴隶主奴役享受。奴隶们稍有反抗，他们则大声叱咤：你们的生命，是我从上天那里给保留下来的，如果你们不服从我，“帝”或“上帝”及我的祖先就要大大的降罚你们，那时候，我就要把你们斩尽杀绝，灭子绝孙。

公元前十二世纪末，周部落在今陕西的渭水流域兴起，先后灭掉了周围若干的戎族，成为商王朝的一个强大藩国。后经周武王东征，并在商奴隶前线倒戈的帮助下，灭掉了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周王朝的建立，意味着奴隶制度国家的高度完成。周王朝的奴隶主贵族承袭了商奴隶主贵族祭天祀祖，敬事鬼神和政权神授的宗教迷信思想，并在商奴隶主

贵族的这些思想的基础上，使宗教迷信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周灭掉了商，为了加强对被征服种族的统治，周奴隶主贵族首先把“上帝”和祖先分开，加强了“上帝”这个至上神的绝对权威，从而提出了“天命”说（天的意志或天的命令），来论证自己统治的合理性。

周灭掉了商，这是对商奴隶主贵族原先所宣扬的对某一固定统治者的“政权神授”永恒化理论的一种致命打击。周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永恒性，为了从思想上征服商奴隶主贵族，于是周奴隶主贵族抬出了“德”和“以德配天命”的理论。《召诰》中说：“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这就是说，做国王的要认真崇尚德政，用德行事，才可以求得永保天命。周奴隶主贵族所说的德，具体内容仍是“从天命、劝人事”。这样他们就在理论上说明了，商王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商的后代不能修明其德以从天命，故失天下，周先祖能修明其德配天命，上天就改变了他的长子，授命于周。周奴隶主贵族周公旦就假惺惺地对商奴隶主贵族讲：“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唯天不弔”（《尚书·多士》）。

被称为奴隶社会大圣人的周公旦，是西周初期最著名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家。他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发表了一整套思想统治的言论。“天命”说可以说是他泡制的。他不仅提出了“德”也提出了“孝”，弄出一套制礼作乐的规则。礼，本来是婚、丧，衣、食、住、行的规则，但经周公整理和后人的修饰，礼便成了奴隶社会的等级名分制度，乐也成了为这种等级名分制度服务的工具。周公由于亲自参加了武王东征和亲自平定了殷贵族的叛乱，看到了由于奴隶的

前线倒戈使殷王朝灭亡的事实，从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不可忽视，产生了对“天”的一些新认识。他提出了：“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引《泰誓》）的思想。在这思想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保民”才能“享天之命”（《尚书·多方》）。“保民”也就是告诫统治者要勤于人事，要注意统治之术，好好地保护奴隶不让他们逃亡和失散，才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不过是把赤裸裸的阶级压迫涂上一层“保民”的欺骗色彩而已，但保民思想的提出，是奴隶起义暴动的结果，是“天”的绝对权威削弱の結果。

商周的宗教迷信是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它随着奴隶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不断地变换着形式，但万变不离其宗，“宗”就是政权神授。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政权离不开神来保驾，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也离不开神来保驾，因而“政权神授”这一反动的理论，后来又发展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支柱之一。

第二节 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萌芽

商周时期，虽然奴隶主贵族所宣扬的宗教迷信占统治地位，但由于生产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推动，无神论的思想也向前发展。冶铸技术的提高及青铜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工具有了很大的改革。出土的商代兵器，农具，器皿就达数以万计之多。商代后期的司母戊大方鼎，重达 875 公斤，通耳高 133 厘米，横长 110 厘米，宽 78 厘米，形状雄伟，花纹精美，是世界青铜器中所罕见的。司母戊大方鼎足以说明当时冶铸的水平。农业实践的深入，人们在和自然的斗争中，积

累了较为丰富的农业知识。天文历法的推算及计算方面的需要，使商周人都具有了一定的数学知识，已经从整数的计算进到了分数的计算。经过世代的创造，商代已经有了文字。从殷墟中发现，甲骨文已有三千多个单字，这些都是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

随着奴隶社会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天”在地上代理人权威的衰落，“天”、“上帝”、“鬼神”的观念也逐渐动摇，在自然知识积累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萌芽。

当时有对世界万物由“五行”，即五种物质元素构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尚书·洪范》篇中曾提到“五行”，似乎周初已有五行的思想。但《洪范》这篇著作似为战国时期作品，同时《洪范》的思想体系又是唯心主义的，因此，我们不能肯定做为唯物主义观点的五行思想已在周初出现。但据《国语》记载，史伯对郑桓公有一次谈话中说，“和”则生物，“同”则不继。一种元素和另一种元素掺和，就能产生新的东西并得到发展，假如用同一种元素相加，则既不能生物又不会有发展。“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从这个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史伯把“五行”做为构成万物的五种原素，这不能不说是具有素朴唯物主义的因素。此外，宋国的大夫子罕也曾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子罕说的“五材”就是指金、木、水、火、土。他认为这些原素都是自然而生的，对人民有重大作用，缺一不可。这和史伯讲的用金、木、水、火、土，构成万物的意思是一样的。史伯在谈话中提到了“和”与“同”两个概念，什么是“和”，什么是“同”呢？春秋时候齐国的晏婴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他说，如果在水中再加上水，那味道还是水的味道；如果弹琴，相同的音调，也不会产生乐声，还是单一的音调，这就是“同”。如果在水中加上鱼，肉，各种作料，再加上烹调，这样就可以做成一种与水味完全不同，味道鲜美的汤；音乐也是这样，只有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声音相成相济，才能成为一曲动听的乐曲，这就是“和”。从晏婴的两个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同”，就是简单的重复；所谓的“和”，就是有对立面的掺和。就其对立而掺和为物来言，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史伯和晏婴所谓的“和”，并不是对立的统一，而是调和。这种调和的思想是晏婴政治上改良思想的理论基础。

“阴阳”说是在天文气象、时节变化观察的基础上萌发的。周人用两种不同性质的阳气和阴气来解释四季的变化和万物的繁茂与凋衰。他们认为，在冬去春来之际，气从地下向上蒸发，万物便出苗生长；如果沉滞不能蒸发，农作物便不能茁壮地生长。阴气的性质是沉滞下降的，阳气的性质是蒸发上升的，这阴阳二气相互协调，配合有序，流转正常，就风调雨顺，否则就要发生灾难。周幽王时的伯阳父，曾用阴阳二气的失调来解释当时在今陕西地区发生的地震现象。他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这就是说，阴阳二气的流转是有一定秩序的，如果发生秩序紊乱的现象，阴阳二气各失其位，于是就要产生地震。伯阳父用自然现象或自然知识来解释自然的变化，是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这些观点之所以称之为素朴唯物主义或唯物自然观的萌芽，是因为它们用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或猜测去解释自然现象本身的规律性。这和当时占统治地

位的“帝”、“神”、“天命”的唯心主义观念是完全对立的。

阴阳五行观念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生产实践和积累的自然知识相适应的，但它还不是建立在正确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特别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很低下，人们的自然知识很狭窄，再加上提出这些观点的人，又往往是当时的贵族出身的史、巫、祝等，因而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带有很大程度宗教迷信的色彩。史伯虽然认为，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成万物，但他又搬出了先王，先王成了造物主了。伯阳父把地震发生的最终原因归结为人事，并以此论证周王朝将要复亡。这就把自然的规律神秘化了，又用以附会人事，最后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宗教迷信的唯心主义那里去。商周时代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萌芽有这么大的局限性，这是当时各种历史条件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

春秋末年的范蠡，参加过越王勾践灭吴的兼并战争，后又弃官事农经商。在这些活动中，他逐渐认识到人和自然的一些关系。他对“天道”做了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解释。他认为“天道”就是自然现象变化的规律。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变化就象“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也就是说象太阳一样，升到正中就要降落，象月亮由圆到缺，由缺到圆，及四季更替一样，发展到顶点，就要向它的反面转化。他还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做了下述三点说明：（一）事物都有其规律，变化需要条件，在条件不具备或不成熟时，不能盲动，掌握了规律，利用具备和成熟的条件就会成功，“强索者不祥”（同上），也就是说盲动就会失败。（二）人的主观努力和自然客观条件是互相为因的关系。他说“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可以成功”（同上）。他还说道，